



近代中国： 思想与外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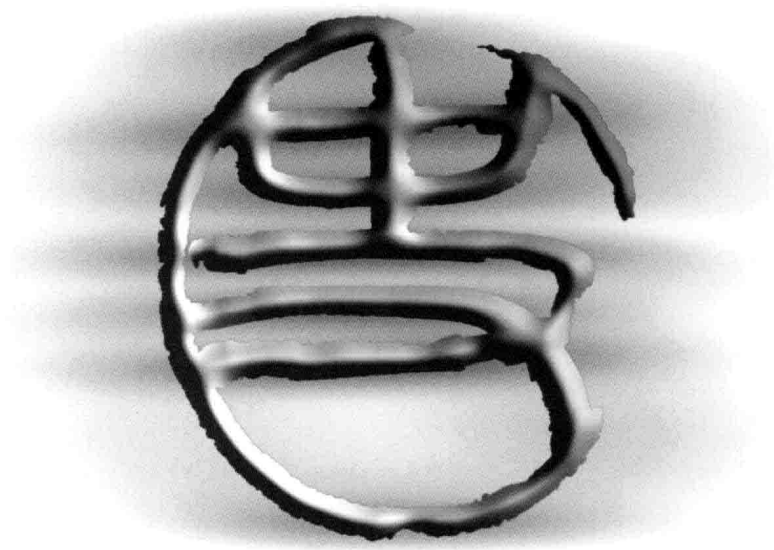
Modern China: Thought and Diplomacy

栾景河 张俊义 ● 主编

(下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近代中国： 思想与外交

Modern China: Thought and Diplomacy

栾景河 张俊义 ● 主编

(下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思想与外交：全2册/栾景河，张俊义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2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
ISBN 978-7-5097-5460-3

I. ①近… II. ①栾… ②张… III. ①中外关系—
国际关系史—近代—文集 IV. ①D8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3799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
近代中国：思想与外交（上、下卷）

主 编 / 栾景河 张俊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吴 超

责任编辑 / 吴 超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60.5 字 数：1084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460-3

定 价 / 168.00 元（上、下卷）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前 言	/ 1
-----------	-----

上 卷

宗藩与独立

——壬午兵变的国际秩序原理论述	张启雄 / 1
记忆中的宗藩关系	
——以跟日本亚细亚主义对应为主	川岛真 / 33
光绪朝中朝关系研究	柳岳武 / 45
史料《华夷变态》与“华夷变态论”的展开	
——以《华夷变态》的研究史（1818~1945）	
为中心	郭 阳 / 63
晚清时期条约关系观念的形成	李育民 / 79
嘉庆时期中俄中段边境防务体系及边境地方层面的交往	
——以嘉庆十年戈洛夫金使团访华前后	
为中心的分析	陈开科 / 103

1839 年中英关于具结与交凶的交涉	张 坤 / 127
赫德与中英滇案交涉再研究	张志勇 / 149
宗方小太郎与近代中国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宗方文书阅读札记	戴海斌 / 181
宫岛诚一郎与中国首届驻日使团交往关系的确立	
——兼论宫岛对朝鲜问题的参与	戴东阳 / 206
乙未割台后中日间台民国籍问题研究	赵国辉 / 222
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交错”与“分歧”	
——关于领事裁判权问题	青山治世 / 243
日英俄法协商体制的成立与中美德合作构想	
(1907 ~ 1909)	小池求 / 263
从弃民到国民：近代华侨身份的回归	
(1904 ~ 1912)	夏卫东 / 283
浅析清华学校早期的英语教学	邹振环 / 307
海牙公断之议与中国外交	
——以 1909 年间中日“东三省六案”和中葡	
澳门勘界交涉为例	尹新华 / 324
有关辛亥革命期间日本与沙皇俄国对华	
政策的再讨论	栾景河 / 342
北京政府时期学人的修约外交理念研究	
——以英文中外关系著作为中心	李 珊 / 355
从巴拿马运河到中国大运河	
——民初中美技术合作的尝试	吴翎君 / 371
南方政府与巴黎和会	
——以代表问题为中心的探讨	张金超 / 395
“一战”华工招募与中英交涉 (1916 ~ 1919)	张 岩 / 409

下 卷

广州政府对英外交探析 (1917 ~ 1924)	张俊义 / 445
--------------------------------	-----------

1924 年英国政府与广州当局合作进剿海盗研究	应俊豪 / 462
英国与 1925 年北京关税特别会议	张 丽 / 486
“民族主义旗帜”下的多方政争：华盛顿会议期间的 国民外交运动	马建标 / 509
<i>China Digest</i> （《中国文摘》）与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海外 中共形象的构建	张龙平 / 537
领海划界与捍卫海疆主权 ——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三海里令”成因论析	刘利民 / 559
傅秉常外交活动及外交思想述论	左双文 / 574
民国时期广货出口与南洋市场	张晓辉 / 600
日军空袭锦州与国际社会反响再探讨	袁成毅 / 620
《华北防共协定》与 1936 年日本对华政策	萧李居 / 633
“怨偶之仇”：中日战争时期的戴季陶	张玉萍 / 656
天津事件与中国人犯之管辖权问题	王文隆 / 675
广田弘毅外相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再考 ——以就任初期的中日关税税率交涉为中心	陈群元 / 692
蒋介石对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因应（下篇） ——多边外交的展开及其结果	鹿锡俊 / 708
战时中日特殊关系下的外交畸形 ——关于汪伪驻日使领馆实态的考察	臧运祜 张 展 / 743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研究	徐志民 / 755
中日战争期间在闽浙的“台湾华侨”	朱浚源 / 781
民族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权衡与抉择 ——1945 年中苏条约谈判中国民政府之因应	吉田丰子 / 808
“二战”结束前后旅意华侨的救济与赔偿	张 力 / 837
宋美龄访美外交成功之背后：心身疾病与 蒋家政治	土田哲夫 / 847
“琉球返还”中的美国因素与钓鱼岛问题	李 理 / 871

不确定的开端：内战末期中共对美政策再探讨…………… 牛 军 / 890

1949 年中共革命视野下的国际法

——以美国驻华使馆若干问题为中心…………… 程 珂 / 915

外交史研究的趋向

——近十年来民国外交史研究综述（2002~2011）…………… 唐云路 / 933

广州政府对英外交探析（1917～19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张俊义

从1917年8月至1923年初，孙中山以“护法”为名，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与北洋各系军阀把持的北京政府相抗衡。广州政权的建立，遭到了在华各西方列强的冷遇与反对，列强们纷视北京政府为当时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认为孙中山建立的政权是中国统一的“破坏力量”。而广州政府建立后，为了争得其合法性地位并获取来自外部的援助，其外交重点也相应地放在了争取在华各列强的承认与支持上。作为一个不被西方列强看好的搞“分裂”的政权，广州政府和孙中山寻求外部承认与支持的努力屡遭挫折，然而他们的努力终有收获。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政府出于摆脱西方帝国主义“围剿”的反帝需要，选择了支持孙中山和他的广州政权，而四处碰壁的孙中山经过慎重考虑，最终选择了联俄容共，从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

对于广州政府的这段历史，由于涉及孙中山晚年的革命活动与国民革命的发轫，因而历来为国内外史学界所关注，研究成果可谓相当丰硕。具体到这一时期广州政府的对英外交，现有的研究成果对有关历史事实的探究已经比较全面，并取得相当的共识。^① 相较而言，现有的研究成果比较关注某一特定事件，对这一时期广州政府对英外交的整体全貌尚缺乏比较系统的勾勒。另外，以往研究往往注重对事件结果的描述与定性，对具体相关细节的描述与把握稍

^① 这方面研究著述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美〕韦慕廷著《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杨慎之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黄宇和著《中山先生与英国》，台北，学生书局，2005。相关研究论文更是为数众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显不足，而这一时期广州政府相关档案资料的匮乏无疑也限制了人们对历史真相的探寻。^① 本文试图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英国政府相关档案，对孙中山晚年在广州三次建立政权期间的对英外交做一系统梳理，以厘清广州政府对英外交的发展与变化，从而有助于研究者对广州政府时期的整体外交形势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与判断。

一 初期对英冷淡

1917年7月，孙中山到达广州，他与西南军阀联合，以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名义，发起了一场旨在推翻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公开敌对的行动，亦即人们所熟知的护法运动。8月，非常国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法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9月10日，孙中山在广州正式就职，独立于北京的广州军事政府正式成立。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两人，下设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交通六个部，其中，任命伍廷芳为外交部部长。1918年4月，军政府发布了《外交部组织条例》，规定了外交部的职责范围和各部门的组织结构。^② 同月，军政府对外发布了致各国驻华使节的通告，宣布：“本军政府承认切实履行中华民国六年六月十二日国会解散前中华民国与各国所缔结之国际及其他一切条约，并承认各有约国人在中华民国内享有条约所许及依国法并成例准许之一切权利。惟北京非法政府违背约法而与各国缔结之一切契约，借款或其他允行之责任，本军政府概不承认。”通告最后希望在华各国“维持正义，承认本军政府”。^③

孙中山依托中华革命党人与旧国民党各派势力并联合桂系军阀、滇系军阀等西南实力派所建立的政权，从一开始便内乱不断、困难重重，频繁的内争极大地束缚了新兴政权的对外活动空间与作为。事实上，由于内争的加剧和西南军阀对孙中山的排斥，孙中山主导的广州政权成立未满一年，即以孙中山的离职而告消亡。

① 除了《大本营公告》这样的政府出版物外，有关孙中山在广州三次建立政权期间涉及中英外交的政府档案基本阙如，中文资料主要散见于当时的报章，比较而言，在英国外交部的档案里保留有这方面的比较丰富的内容；此外，广东省档案馆所藏粤海关档案里的《各项事件传闻录》中也收录了不少当时海关情报部门搜集的关于广州政权的内幕情报。

② 《军政府公报》第75号，1918年4月23日。

③ 《大元帅通告驻华各国公使书》，1918年4月17日，《军政府公报》第75号，1918年4月23日。

1918年4月，西南军阀联合非常国会内的政学系议员，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决定改组军政府，改大元帅制为七总裁合议制。5月4日，孙中山向非常国会辞职；5月20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唐绍仪、伍廷芳、林葆懌7人为政务总裁，实际上排斥了孙中山的领导。21日孙中山愤而离粤赴沪。这样，孙中山第一次在广州尝试建立政权的努力失败。

1920年8月，粤系陈炯明所部在福建漳州誓师，回粤讨伐盘踞该省的桂系军阀。同年10月，粤军击溃桂军，占领广州。随后，陈炯明多次电邀当时寓居上海的孙中山回粤主持大局。1920年11月，孙中山偕同伍廷芳、唐绍仪等人离开上海，经香港前往广州。29日，孙中山在广州重建护法军政府。此为孙中山第二次在广州建立政权。

第二次建立的政权，并没有得到在华列强的承认，为获得国际上的承认，孙中山首先瞩目非常国会选举出一个非常大总统，在其努力下，4月7日，在穗的222名国会议员在召开的非常国会上选举孙中山为总统。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

以护法为名在广州另立政权，外交上的当务之急便是获得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支持与承认，因此，广州政府的外交重点基本围绕着争取在华各主要列强的承认与支持而展开。第二次护法前后，在谋求列强的支持上，孙中山把希望放在了联德与联美上。在1917~1922年，联德外交曾经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此期间，孙中山曾多次派人与德国驻华外交官秘密接触。有研究者认为，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即曾接受过德国方面的秘密资金援助，在第二次护法期间，孙中山还派专人赴德国，游说德国政府和企业界人员，支持他的事业。^①

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与美国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孙中山的许多治国理念包括革命思想受美国影响颇深，因此联美并争取美国政府的支持，一直是孙中山外交重点，在护法运动期间，孙中山曾多次给美国总统和在华外交官写信，推销其治国理念，希望美国政府承认广州政权并对其给予援助。^②

然而，在两次护法前后，在寻求在华列强的承认与支持之际，孙中山对老

① 关于孙中山联德外交的最新研究，请参阅李吉奎《孙中山联德外交始末》，载栾景河、张俊义主编《近代中国：文化与外交》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469~480页。

② 参见〔美〕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杨慎之译，第104~117页；陈三井：《论孙中山晚年与美国的关系》，《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牌的殖民帝国英国则表现得颇为冷淡。究其原因，则与孙中山对英国的认识和英国政府的在华作为有密切相关。

孙中山与英国及英国殖民地香港的联系也有颇长的历史渊源，他早年在香港接受英式教育，毕业于香港的西医书院，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秩序井然和社会繁荣曾给青年时期的孙中山留下深刻印象，令其萌生了投身革命、改造社会的思想，孙中山1923年在香港大学演讲时曾自称香港是其革命思想的发源地。^①1895年，孙中山将革命组织兴中会的总部设立在香港，英国殖民地香港一度成为孙中山从事反清活动的宣传基地、筹款基地和武装起义的指挥部。从1896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曾五次到欧洲宣传革命和筹款，这期间曾多次以英国为中转地。1896年，孙中山第一次从美国到英国，曾被清政府驻英使馆派出的密探秘密诱捕，后经其英国老师赫胥黎等人多方营救才脱险，这段伦敦蒙难经历曾令当时的孙中山在海内外一时声名大振。

然而这些与英国的渊源并未让他对英国产生多少好感，英国对中国的殖民侵略是让孙中山最为诟病的，在由他口授、朱执信执笔的《中国存亡问题》一文中，孙中山对英国抨击尤烈，指其在华首设领事裁判权、割占中国领土、强占租界和划分势力范围，驻兵迄27载，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②

孙中山反对中国参加“一战”，他认为英国是唆使中国参战的真正幕后黑手。1917年5月，孙中山特地发表《中国存亡问题》一文，以全面表达其反对北洋政府参战的立场，在其中，孙中山对英国唆使中国参战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论此次之劝诱中国，美、日居其冲，而英国若退听焉。考其实际，则英国为其主动，而美、日之行动，适以为英政府所利用耳。^③

孙中山认为，中国参加欧战是受到了英法的胁迫，而英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将中国拖入战争，而参战对中国是有害无利，战争双方无论谁胜谁负，都会以瓜分中国为诱饵，中国都将是最终的受害者。

因此，在护法初期对外寻求援助上，孙中山并未与英国有过多的接触。在

① 《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第115～116页；以下各卷均为此年版。

② 孙中山：《中国存亡问题》，《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9页。

③ 孙中山：《中国存亡问题》，《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62页。

孙中山第二次建立政权期间，广州政府与英国仅有的几次交往都是不愉快的经历。

第一次事件是在孙中山第二次回粤建立政权后不久，广州政府尝试收回关余与驻华公使团和英籍总税务司安格联展开的交涉。

关余是指海关税收在扣除了以关税作抵押的外债和赔款之后所剩的余额部分。作为国家税收的一部分理应由中国政府保管，但是由于中国的海关管理权长期在外籍税务司的掌控下，辛亥革命后解送关余的权力便落到了在华列强组成的公使团的手中，成为操控中国内政的一个工具。1918年中，孙中山首度在广州发起护法期间，经列强的同意，广州政府曾获得13.7%的关余份额。从1919年7月开始，军政府获得首批关余，其后，关余均按比例如数拨付，直到翌年3月，军政府发生分裂，伍廷芳携“应用文件、印信及关税余款”离粤赴沪。随后，公使团以“避免助长内争”为由，将军政府应得的关余份额，暂交总税务司代为存储。到1920年底，公使团不再同意“将属于中央政府之全部关余，摊交未经承认之政府”。其后，总税务司安格联串通北京政府，将全部关余拨充内债基金，连南方政府应得部分关余一并划入。^①

列强的这种做法，招致孙中山和广州政府的激烈反对，因此，第二次回粤后不久，孙中山便命郭泰祺于1920年底向列强提出拨付关余的请求。1921年1月，广州政府正式致函公使团，要求公使团依例向广州政府拨付关余。同时外交总长伍廷芳致函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要求从2月1日起，海关机构必须服从本政府的命令和监督，本政府准备承担按比例摊付的债额。^②

1月18日，在北京的公使团开会，决定严词拒绝，以“无论如何不能放任中国政府正供之关余，供应无意识政争之用”一口回绝。对此，南方政府以强硬态度相对。1月21日，外交总长伍廷芳发布命令：“凡在军政府所属各省海关，须自2月1日起，服从军政府之训令，听其管辖；但各省关税仍照前尽先摊还外债，绝不欲稍有妨碍债权人利益。”列强则以武力威胁对应，并从香港派兵200名至广州西堤“护关”。^③

① 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请参见吕芳上《广东革命政府的关余交涉（1918～1924）》，高纯淑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选集》第3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4，第650～654页；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民国部分），第100～102页。

② 《伍廷芳致安格联》，1921年1月，《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

③ 吕芳上：《广东革命政府的关余交涉（1918～1924）》，高纯淑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选集》第3册，第654～658页。

在此次关余交涉中，英国政府的态度是只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不与广州军政府打交道，如广州方面对粤海关采取行动，英国将联合列强一道进行干涉。1月27日，英国外交部致函殖民地部，在现在的危机中，寇松（Curzon）同意采取1918年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建议采取的行动。广州总领事所建议的行动包括派军舰封锁广州，武力护关。^①

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James Jamieson）致电英国海军驻中国司令达夫（L. Duff），如果2月1日出事，就采取行动。他要求达夫向其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采取的行动包括封锁广州、沿西江护送食品等。为应付局势，英海军向广州增派了1艘军舰，使广州英舰数量达到3艘。面对包括英军在内的武力威胁，2月1日，广州政府通知粤海关税务司，他们决定推迟采取行动。^②

孙中山将广州政府在关余问题上受挫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英国的破坏。2月2日，孙中山在广州会见美国海军武官哈奇斯（Hutchins）和美国记者吉尔伯特（Rodney Gilbert）时曾抱怨列强对其控制海关的强硬态度，他特别提到列强方面令其计划受挫的主要责任人是英国公使馆和驻广州总领事杰米逊。^③

收回关余的交涉是孙中山晚年所经历的时间跨度最长、过程最为曲折的一次外交交涉，它对孙中山晚年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第三次建立政权时又重启关余交涉，并最终取得了部分成果。在关余交涉中，英国政府和驻华官员、英籍总税务司的表现，给孙中山留下了一个很坏的印象，它直接影响了孙中山后来在涉英事件中对英国政府政策与意图的判断。

第二次事件是在1921年5月4日，即孙中山在广州举行非常大总统就职典礼的前一天，英国殖民地香港华民政务司罗斯（Ross）派人在港贴出中文告示，以维护社会治安之名，禁止港人集会庆祝广州成立的新政府。5月6日，罗斯又发布了第二张告示，告诫香港居民不要为广州政府筹募款项，并指出，所募者并非公债，将来或将取消作废，而孙文建设之政府，旦夕有破产之虞，故不能希望其能偿付任何款项，望香港居民不要为其所骗。^④

①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ed., *British Document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2, Series 5, Vol. 24, p. 74.

②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ed., *British Document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2, Series 5, Vol. 24, pp. 358–359.

③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ed., *British Document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2, Series 5, Vol. 24, p. 74.

④ Enclosure 2, Enclosure 3 in Alston to Curzon, July 25, 1921, F. O. 405/232, pp. 59–60.

对于港英政府的挑衅行为，广州政府反应强烈。5月13日，广州政府照会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提出抗议，指出港英政府的这一举动非常不合时宜，它不仅污辱诋毁了孙中山大总统和广州政府，而且为外交史上所罕见的举动。照会最后要求香港总督对此做出解释。^① 广州各界也举行集会，声讨港英政府的行为。^②

其后香港总督司徒拔（Reginald Stubbs）于5月23日对广州政府的抗议做了答复。他声称，告示发布时他不在香港，此事未经过他的批准，不能同意，他对告示所使用的不礼貌语言深表歉意。然而，司徒拔又辩称，他所反对的只是告示所使用的不礼貌措辞，对告示所表达的宗旨完全赞同。港英政府只承认北京中央政府，因此，港英政府不可能允许在港为敌对一方总统的就职举办庆祝活动 and 为其筹募资金。^③

广州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再次致函杰弥逊，对港督司徒拔的说辞进行了驳斥，指出：“香港当局干涉香港居民举行庆祝活动和对本政府给予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其行为明显超越了英国政府所奉行的友好中立的界线，属公开的敌对行为。”^④

香港方面的主动挑衅，连一向对孙中山持敌视立场的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也觉得有些过头。他认为，香港政府的过激举动不得人心，致使一向敌视国民党的一些中国人都对广州政府表示了同情。杰弥逊在写给驻华公使艾斯敦的信中指出，明智之举是港英政府取消所发告示。^⑤

面对各方压力，港英政府最后被迫做出让步，不久派人将告示撕毁收回。^⑥

在第二次护法期间，广州政府与英国间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件，那就1922年1月所爆发的香港海员大罢工。香港海员为提高工资待遇在香港发动罢工，表面上看不过是一起在香港发生普通的劳资纠纷，但是在中国当时民族主义高涨和劳工运动勃兴的大背景下，此次罢工便有了极其重要的特别意义。对于孙中山领导下的广州政府和英国统治下的香港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言，这次

① The Commissioner for Diplomatic Affairs to Jamieson, May 13, 1921, F. O. 405/232, p. 60.

② 《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5月24日。

③ Stubbs to Jamieson, May 20, 1921, F. O. 405/232, p. 62.

④ C. C. Wu to Jamieson, May 24, 1921, F. O. 405/232, pp. 63-64.

⑤ Jamieson to Stubbs, May 17, 1921; Jamieson to Alston, May 12, 1921, F. O. 405/232, p. 61.

⑥ 《民国上海日报》1921年5月25日。

罢工所造成的影响也颇为重要。

首先，香港的罢工得到了广州方面的声援与支持，令孙中山在香港劳工阶层中声望大增。其实，海员罢工爆发时，孙中山正在桂林整军筹划北伐，对于香港罢工情况，事先并不知晓。在罢工初期，是陈炯明主持下的广州政府，腾出一定数量的房屋，安置罢工后返穗的香港劳工，并先后拨出约 10 万元，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①

表面上看，广州政府的支持香港海员罢工上态度并不鲜明，在海员罢工期间，广州政府并没有公开发表任何有关支持海员大罢工的文件或言论。孙中山当时正致力于北伐大业，他不愿因此事与英国交恶，并招致列强的武装干涉，所以在接受外国记者的谈话时，孙中山更是极力地洗刷其与海员罢工的干系。^②

其次，尽管孙中山表面上表现出“仁慈中立”，并且在海员罢工期间也有可能并未直接施以援手，但是从 1917 年在广州开展护法运动起，在支持劳工组织和劳工运动上，孙中山和他的广州政权的确发挥过积极的作用，^③ 因此，香港海员罢工取得胜利后，以海员工会为代表的香港劳工组织愿意相信，罢工的胜利有孙中山的功劳。因此，在香港的劳工阶层中，孙中山就有了巨大的影响力。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一年以后孙中山到广州开始第三次建立政权时，主动提出与英国和香港改善关系，个中原因之一，很有可能是其受到了海员罢工胜利的鼓舞，让他看到了可以借助其在香港劳工阶层的巨大影响力，来迫使港英当局与其改善关系，我们事后对港英当局从一反常态地由坚决反对孙中山，转到愿意与孙中山改善关系的表现来看，虽然港英当局的态度不能代表整个英国政府的态度，但孙中山在香港工人心中身份的变化，对此后的广州政府与英国的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另外，海员罢工对港英当局的影响则更为的巨大。首先，海员罢工令港英

①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新华书店第 2 版，1953，第 59 页。

② 1922 年底，孙中山在接受记者约翰·白莱斯福的采访时说：“当罢工事起时，余在广西桂林，其地与广州不通火车，余方以全力注于北伐。彼时主管广州政府者为陈炯明。余初不知有罢工事。直至吾人军用品因交通断绝不能达梧州时，余始知之。至余对罢工者之感想，苟彼等之目的为经济的，余固予以同情。而彼等之罢工，其后虽牵政治，原始时实为经济的也，但谓余赞助罢工，以期损害英国利益，余绝对不能承认。”参见《孙中山全集》第 6 卷，第 635 页。

③ 有关孙中山支持香港与广东工运的研究，可以参见陈明铨《孙中山先生与清末民初广东工运——民族主义、地缘主义和革命动员》，载陈明铨主编《中国与香港工运纵横》，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1986，第 3～20 页。

政府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香港对广东的严重依赖性。香港的劳动力绝大多数来自邻近的广东，海员罢工期间，罢工工人纷纷返回内地，致使香港百业凋零，商务陷于停顿，经济上蒙受重大的损失。而罢工委员会对香港的经济封锁，更使香港的食品来源中断，居民的日常生活备受影响。港英政府后来在总结此次罢工对香港的影响时曾特别指出，“此次罢工强烈地表明本殖民地对广州的绝对依赖，一次有组织的杯葛即会对我们造成巨大的危害”。^①

其次，港英政府从一开始就断定广州政府操纵与支持了这场罢工。港督司徒拔在向英国殖民地部报告罢工情况时指出，香港的“海员罢工不单纯是一场经济运动，而是一场政治运动”。“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是此次罢工的幕后组织者。广州政府已完全处于这一具有布尔什维主义性质的组织的控制下。毫无疑问，极端主义者站在孙的一边。”^②

对于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政权，港英政府一直持极端敌视态度，海员罢工后，港英政府多次上书英国外交部，甚至建议政府出兵，直接占领广州，但被英国政府所拒绝，英外交部就此事向殖民地部指出：“我们不可能通过正常途径对广州政府施加压力，因为国王陛下政府并未承认该政府。因而，武力之说是适当的。”^③

像所有西方列强一样，港英政府一开始对于孙中山在广州建立的政权持轻视的态度，认为孙中山无财力，没人手，仅凭借个人魅力及少数追随者，难以成事。在海员罢工时，孙中山的这种捉襟见肘的境遇并未发生多大改变，然而，大罢工给香港所造成的损失，则让港英当局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劳工阶层的力量和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精神，而更重要的是孙中山在劳工阶层中所展现的巨大威望，让他们自此对孙中山与他的广州政权再也不敢小觑，所有这些对后来港英当局的态度发生变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在20世纪前期，英国的对华政策可简单归结为维持中国的现状，即对外寻求列强间的势力平衡，对内则支持北洋政府。对于中国国内的各派纷争，英国采取的是不介入的“静观政策”。对于孙中山，英国国内政客冠以“幻想家”“极端分子”“麻烦的制造者”等称呼，他们视广州政府为反叛中央的地方政府，从不予以承认。不过，伦敦官方并不认为孙中山是一个真正危险的激

① Report on Seaman Strike by Hong Kong Government, Mar. 14, 1922, C. O. 129/474, p. 236.

②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Feb. 28, 1922, C. O. 129/474, p. 163.

③ Foreign Office to Colonial Office, July 8, 1922, F. O. 405/237.

进分子，因此英国外交部不赞成对孙中山采取极端敌意行为。^①

这一时期由于美、日等国的崛起，英国在华地位有所下降，但即便如此，英国的对华贸易与投资在列强中间仍名列前茅，特别是在华南及长江流域这些英国传统的势力范围内，更是有着重大的经济利益。和其他列强一样，英国政府并不看好孙中山和他的广州政权，问题是他们也忽视了孙中山所代表的争取独立与自强的民族主义精神，随着国内民族主义的不断高涨和国内革命的勃兴，在华南地区拥有巨大经济利益的英国自然首当其冲，只是让英国政府没有料到的是，事件的发展竟会有如此多的变故与意外，令广州政权与英国的关系像一出充满了悬疑与冲突的话剧。

二 与英国尝试改善关系

孙中山第二次护法后不久，其力主以广东为基地实施的军事北伐，与陈炯明所谋求的“联省自治”发生很大矛盾，双方矛盾迅速激化。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军事政变，孙中山被迫离粤，二次护法遭遇失败。

孙中山离粤回到上海后，立即筹划对陈炯明的反击。不久，1923年1月16日，拥护孙中山的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及倒戈粤军联合组成西路讨贼军，对陈炯明部发起攻击，陈军败出广州，退至东江。2月21日，孙中山重回广州，设立大元帅府，此为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

还在上海期间，虽然在广州连遭二次失败，但孙中山个人声望确与日俱增，美国驻上海领事曾评论道：“在南方受到排斥后，他已经变成为比南方共和国首领甚至更加伟大的全国性人物，一大批北方的卓越的、知名的官员都在寻找他的支持。”^② 在寻找外援上，孙中山的联俄谈判也取得进展，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和苏联特命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宣言”，标志着联俄进入正式实施阶段。在强有力的联俄背景下，回粤前夕，为确保重新建立政权的稳固，孙中山主动尝试改善与英国及香港的关系。

在上海，孙中山授意陈友仁分别于1月11日和19日两次拜会了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巴尔敦（S. Barton）。在第一次拜访中，陈友仁告诉巴尔敦，孙中山亟欲采取一项赢得英国同情的措施，将提供他对于改善中英关系兴趣的证据。

① Richard Stremski, *The Shaping of British Policy During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Taipei, 1979, p. 12.

② [美] 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136页。